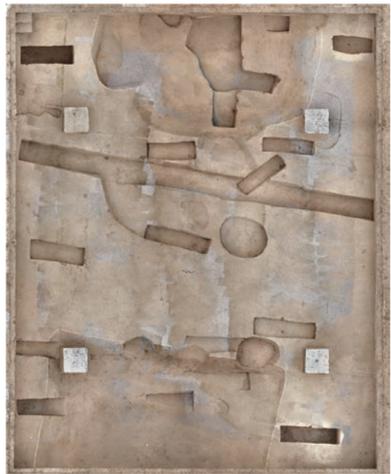


殷墟商王陵区及
周边考古勘探和
发掘收获

东园沟G1南段第二地点探方 东部为打破东园沟的东汉晚期砖室墓M1



东园沟G1南段第二地点探方西壁剖面 第3层以下为G1填土层

202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开展商王陵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首先是通过勘探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其次是摸清商王陵区的范围,后续摸清洹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

考古工作概况

考古勘探概况

2021年8月至2022年3月,对商王陵及周边进行考古勘探。截至2022年11月,勘探总面积超过239800平方米,其中普探面积130600平方米,重点勘探109200平方米。

本次勘探区域较大,但各地点的地层大致相同。以过去在殷墟遗址其他地点发掘所见生土层为基准,可分为4小层。其中第3、4层在不同区域的厚度略有差异,总的情况是偏北部薄,南部略厚。古代文化层在第3层下。

发现古代遗迹有围沟、祭祀坑、墓葬、房址、井、灰沟、窖穴、灰坑、路沟等。

发现围沟2个,东西相距40米。东园沟(G1)围绕在王陵东区的大墓和大量祭祀坑周围。东西间距大致为246米,南北236米,近正方形。沟的宽度不一,口部宽超过10米,最深处3.5米。西园沟(G2)围绕在王陵西区的大墓周围。两个围沟各发现缺口两个。以围沟为界,王陵区的范围东西560米,南北300米。

在王陵公园墙以东110米的范围新探出祭祀坑460座以上,王陵区祭祀坑总数超过2800座以上。这次探出形制与以往考古发掘的殷墟时期祭祀坑基本相同,不排除少数为墓葬,南部略厚。古代文化层在第3层下。

发现周商时期房基38座、井3座、陶窑3座,商周时期土坑竖穴墓165座,另有37座需再确定。还有灰沟14条、窖穴5个、灰坑319个。

发现干道的路沟一条,口部宽超过10米,为干道的路沟。南北长超过1200米,从武官东地向北延伸到小营东地,中间发现十字路口2个。南头南距洹河100米。路土和近路的上层填土中出土陶片是商周时期的。

探出砖室墓76座,洞室墓44座。另有晚期墓(包括近代)43座。还发现晚期井52座,晚期坑245个,晚期沟32条;还有晚期路多段。

考古发掘概况

2022年选四个地点发掘,其中第一地点在西园沟G2南段上(王陵公园墙西南角外),第二、三地点分别在东园沟G1南段偏西部、西段缺口上(王陵公园内),第四地点在东园沟东段内的祭祀坑区(王陵公园内东墙外)。实际发掘面积超过700平方米。发掘所见遗迹包括商代晚期、西周、东汉、宋元等时期。其中商代晚期有围沟2个、祭祀坑14座,西周时期的房址3座、墓葬2座、灰坑109个(侯家庄北地99个,王陵公园10个)。工作期间按需要对大场景、遗迹拍摄照片和影像,及时三维建模和出正射影像;对骨骼标本及时采样,为后续综合研究做好准备。

商代晚期遗迹

东园沟G1 第二解剖点探方2022AW-GNW02T9107、T9108所见,沟口距地表深0.7米左右,开口于探方第3层下。口部宽14米,深近2.6米。打破它的最早单位有一座砖室墓M1(东汉晚期)。

填土分10层。第①层:深褐土,土质疏松,包含物较杂,植物根茎、碎石、陶片等。第②层:黄褐色偏褐土,与①层土较接近,土质疏松,含沙量较大,土壤粘聚力小,包含物较少。第③层: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土壤粘聚力小。包含少量陶片。第④层:红褐色土,土质疏松,沙土,土壤粘聚力小。包含少量陶片。第⑤层: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土体纯净,包含物较少。包含少量陶片。第⑥层:深褐土,包含大量黑土,少量黄土,土质较疏松。粘聚力相对较大,包含物多,主要为陶片。第⑦层为黄色淤土,土质较实,较质密,粘聚力大。包含物较丰富,主要为陶片。第⑧层:褐色土,土质稍紧实,土壤粘性强。包含物较杂,包括陶片、红烧土、骨等。第⑨层:红褐色偏红色土,土质较紧实,土壤含沙量大。土质较为斑驳,包含物较杂,包括陶片、骨等。第⑩层:红褐色土,土质紧实致密,不含沙,

包含物有陶片。在第②-⑩层都出土有碎陶片,其中第③层出土战国时期的陶豆,第⑥⑦⑧层出土西周早期的豆、罐等陶片,第⑨层出土少量殷墟时期陶片,还有骨器残片。第⑩层出殷墟陶器足。

第三解剖点所见,沟开口于2022AWGNW02T9117、T9118、T9119、T9217、T9218、T9219、T9317、T9318、T9319的第3层(北部探方)或第4层(南部探方)下。缺口处宽10.5米。缺口南北面的沟深1.5米以上,填土都分6层。第①层:黄褐土,夹黑斑,较疏松。第②层:黄褐土,颜色偏红,含沙,夹黑斑,土质疏松。第③层:黄褐土偏黄,夹黑斑,含沙。第④层:黄褐土偏黄,夹少量黑斑,较纯净,土质疏松,含沙,颗粒较大。第⑤层:灰褐土,纯净疏松,含沙,颗粒较大。第⑥层:灰褐色细沙土,疏松纯净。出土物极少。

西园沟G2 解剖点探方2022AHB-NW12T0704、T0705中所见,G2被西周早期的M1、M2、F1以及灰坑打破。仅剩沟底部分,残宽7.35米,残深0.7米。沟内填土剩3层:第①层为黄黄土,略发红,较杂乱。第②层为黄黄土,发白,较为纯净。第③层为沟底淤积土,呈灰黑色,较致密。三层未见遗物。

祭祀坑

清理30多座。其中多常殉人与狗,一坑中人的个体多者3人,沟的个体多者达11只。少数坑中埋青铜器、玉器,或埋有羊的左前腿。

西周遗迹举例

房址3座 2022AHB-NW12F1,西周早期。残存地基部分,探方内东西宽5.0米,南北长10.15米,厚1.6米。夯层厚10厘米左右,土色呈黄褐色或灰褐色花土,土质致密。出土物有陶片、动物骨骼、石器、蚌片、铜器残件等,可辨器型有罐、高、盆等。还在不同夯层下有奠基坑7座,内埋葬有年龄不等的婴幼儿与青少年。F1打破西园沟G2。

墓葬2座 2022AHB-NW12M1,西周早期。竖穴土坑墓。口部长方形,长3.15、宽1.52、深3.7米。一椁一棺。墓主骨骼保存一般,葬式为仰身直肢,头朝西,略向北侧。男性。墓底腰坑内殉狗一具。随葬玉戈1、陶鬲1、贝3。M1打破西园沟G2。

收获与认识

新探明王陵区有两个围沟,东西并列,各自闭合,各有两个缺口可出入。围沟围绕在殷商大墓及祭祀坑的外围,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东园沟东、西段的北端偏向东,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发掘发现多组晚期遗迹打破围沟,其中中砖室墓打破G1,西周早期遗迹打破G2。尤其是据西周早期遗迹打破G2,证明G2早于西周早期;在G1南段底部第十层出殷墟时期陶器,其上的⑥⑦⑧层出土西周早期陶器,年代关系清晰。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障壕。以围沟外边界为基准,确定王陵区的范围东西560米,南北280米。

以往考古发现所见凤翔秦雍城城南的春秋时期秦公陵园,在各组秦公墓周围有障壕,殷墟王陵区陵墓障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到商代晚期。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

新发掘祭祀坑多殉人与狗,个数不一,部分坑中埋有青铜容器、陶器,时代明确为殷墟二期。为研究王陵区祭祀坑的时代、商代祭祀活动及其形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王陵区西部西周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将推动周人灭商以及周王国国家治理方式的研究。



东园沟G1南段第二地点探方西壁剖面 第3层以下为G1填土层



东园沟内祭祀坑K17



陶渠M16三号车与内铜器



陶渠M28一号车与内铜鼎、铜甗



陶渠M16“京”铭文铜戈



陶渠墓葬出土土原瓷片、骨笋与制骨废料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京”邑

陕西韩城陶渠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陶渠遗址位于韩城市芝阳镇陶渠村东北、西赵庄村西,跨芝水河南两岸。

2020年5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韩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该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通过两年多的工作,基本摸清了陶渠遗址的年代、布局、结构、内涵等,陶渠遗址两周时期遗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遗址北部以东向西向壕沟为界,有高等级居住区、普通居住区、大型墓葬区、中小型墓葬区等。

2020年5月至今,共布设探方两处,分别是I象限陶渠大中型墓葬区、IV象限西赵庄小型墓葬区,陶渠大中型墓葬区有“甲”字形大墓8座,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墓葬均为东西向,墓道在东侧,M28、M17、M31、M26的南侧发现有长方形车马坑K1~K4。IV象限西赵庄芝水河南岸墓葬区发现小型墓葬4座。

在发掘完成的七座“甲”字形大墓以及车马坑K1的填土中均发现有板瓦、筒瓦、陶器残片等,M26、M28、M29、K1等填土中还发现有原始瓷片、骨器、制骨废料等,说明在大型墓葬建造之前,此区域或是高等级居住区、制骨作坊等。

已发掘“甲”字形大墓7座,M16为其中规模最大者,全长36.6米,墓道长28.5、宽3.8~4米,墓室长8.1、宽6米,深约9米。M31全长32.7米,墓道长25.3、宽3.6~3.8

米,墓室长7.4、宽6.1米,深8.8米。“甲”字形墓葬均被盗严重,四周有活土二层台,除M16外,其余六座大墓均发现有1~3个数量不等的殉人,较为特殊的是M29东北侧殉人为“俯身葬”;M16采集有“玉覆面”残片。

“甲”字形大墓在墓道中均埋葬有数量不等整车马,马车有两马、驷马之分,根据墓葬规模略有等差,M16、M31随葬7辆车,M17墓道埋葬6辆车,M1、M26、M28、M29墓道埋葬5辆车,车辆在墓道内依次排列,个别车舆内有放置器物的现象,如M28墓道一号车舆内出土铜鼎、铜甗,M16墓道一号车舆内出土2件铜戈,均有铭文“京”字,M16墓道三号车舆内出土3件铜铃和1件铜小罐。

中型墓均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位于“甲”字形墓的东西两侧,共发掘五座。中型墓墓室长4.5~5.5、宽3~4米,墓室四周有活土二层台。陶渠M20、M23、M32、M33有1~2具殉人,多分布于西、北两侧的二级台上。M23、M32墓室底部有腰坑,坑内殉狗。墓葬被盗严重,残存少量陶器、海贝、石磬、铜器残片等。

小型墓两座,陶渠M35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长3.2、宽1.8、深1.3米。墓室四周有活土二层台,不见殉人,墓室中部被汉墓洞室部分打破,墓室情况不明,出土陶器有鬲、豆、罐等。

西赵庄M1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长3.2、宽1.75米,深4.1米,墓室南北两侧有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椁两棺,墓室头向东、仰身直肢,出土陶器有鼎二、鬲二、豆四、罐二,还发现有动物骨骼、泥器、贝类等。

发掘前,学者多认为陶渠遗址是春秋时期的梁国遗址;综合墓葬的年代、葬制葬俗以及“京”字铭文等,初步判断陶渠遗址的性质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京”邑。

“京”氏为嬴姓,其族源自东方;自宋代以来发现两周时期十余件“京”氏器,西周金文中有“京夷”与“秦夷”等并称。《竹书纪年》记载“晋武公元年,尚一军。芮人乘(偷)京”,此时“芮”在韩城梁带村,距陶渠遗址直线距离22公里,进一步证实陶渠遗址为“京”的合理性。

《清华简·系年》记载“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关于“京师”地理位置争议颇多,陶渠遗址为“京”邑,从地理方位来看,陶渠遗址亦有称“京师”的可能。

陶渠遗址是关中地区两周之际为数不多的畿内封邑遗址,对研究周代的分封制、政治地理、“夏夷融合”等问题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关于陶渠遗址的布局、功能分区等问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相关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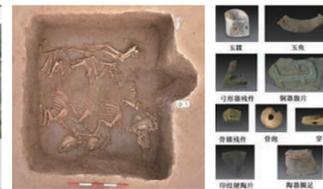
探索周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突破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考古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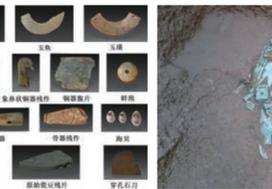
西北大学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分布范围



上庙墓地马坑MK1



M90部分遗物



M98西侧二层台残存车马器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约1公里西头村,地处泾河东岸台塬边缘地带,距泾河约5千米。2018年至2022年由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川五个地点,发现仰韶、龙山、先周、西周、汉唐等各时期遗存,共发掘灰坑650余座,墓葬140座,陶窑、房址、灰沟等各类遗迹40余个,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该遗址的发掘对泾河流域先秦时期文化序列、区域聚落形态及周文化起源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为区域考古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通过区域性系统调查及考古勘探工作,确认西头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其中以商周时期遗存为主体,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从目前考古工作来看,西头遗址发现的西周大型城址、围沟墓地及多座甲字形大墓,无疑显示了该遗址的高等级特征,与邻近的长武碾子坡、彬县新泾、旬邑孙家、枣林河滩、下魏洛等遗址相比较,西头遗址商周遗存有内涵丰富、时代延续长、聚落规模大、墓葬等级高等特点。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工作,拓展了泾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新局面,也为探索古“豳”地考古研究寻到了突破口。

西头遗址构建起区域商周时期的年代序列,为探索周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新基点 西头遗址鱼嘴坡地点位于台塬边缘斜坡地带,该地点发现有丰富的先周时期遗存,揭露有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遗物以高领袋足鬲为主体,文化面貌与碾子坡文化较为接近,主体年代为商代晚期;分布于台塬顶部的南头地点见有西周早期的灰坑、灰沟、陶窑等遗迹;尖子地点也发现有先周时期遗存分布,该地点亦发现西周中晚期遗存;斜川地点发现西周早中期居住与冶铜遗迹;上庙地点发现围沟墓地,已发掘的120座墓葬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通过对出土遗物的类型学比较,并结合碳十四系列样品测年,建立起了从晚商至西周晚期的年代序列,为区域文化演进提供了重要标尺。依据考古资料,可将区域内商周时期划分为:“孙家”类型(晚商偏早)一碾子坡文化遗存(晚商偏晚)一“混合”遗存(商末周初)一周文化遗存(西周中晚期)四个阶段。西头遗址为探索文献所载“公刘居豳”“古公亶父迁岐”等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考古学线索,为研究周文化起源与发展过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基点。

西头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大型城址,为

“豳”地历史及王畿地区统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径 在遗址西侧区域发现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通过考古勘探与局部解剖可基本确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东城墙北段由两道夯土墙构成,外侧宽4、内侧宽2.7米,两者相隔约3米,城墙外壕沟宽约8米,距地表深约4米。对南城墙东段和西段进行解剖,显示城墙仅残留基部分,其中南城墙东段基槽厚口大底小状,开口宽8.1、底宽5.5米,夯层厚1.4米,可划分为25层,夯土土色不一,主要为灰、灰褐、黄褐与棕褐色。据打破基槽的灰坑出土遗物来看,城墙西周晚期被破坏,结合城址内遗存年代,可判断城址的年代为西周早中期。西头城址的确认,为文献记载的“豳”“京师”探索拓展了新路径,也为西周王朝在泾河流域的统治方式研究提供了新例证。

西头遗址建筑基址、冶铜遗迹及储粮遗迹的发现,为西周城邑的功能结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尖子地点位于城址中部近东城墙处,该地点发现有西周时期的房址和大型储水坑。H43平面近椭圆形,长径约20、短径约15米,最深处超过6米,剖面呈弧形、圈底,东壁有明显的加工痕迹。坑内堆积分为27层,均为由四周向中心倾斜的坡状堆积,坑底见有淤土层。据出土遗物判断该遗迹为西周中期,据形状及堆积情况可判断该遗迹为储水设施,该类遗迹的发现为城址内供水研究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资料。

斜川地点位于城址内东北部,发现有冶炼残炉、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等冶铜遗迹;该地点发现有较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和刻文陶器,从出土遗物可判断,该地点冶铜和建筑基址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城内夯土建筑基址与冶铜遗迹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城址的聚落布局与高等级特征。

南头地点位于南城墙外侧,发现深穴式储粮遗迹,以H154、H394为代表,两者年代为西周中期。H154整体近长方形,筒状竖穴,四壁较为规整,可见修整的工具痕。开口长4.8、宽3.1米,底部长4.0、宽2.1米,深6.1米,坑底北侧留有2米生土台。窖穴坑壁发现有板灰痕迹,坑壁发现有两根倾斜木柱,坑内大型三足瓮发现有炭化粟痕迹。坑底土质坚硬,应经过人为处理,近坑底见有厚2~4厘米的植物秸秆类堆积层,其上部发现少许黄褐色植物种子。坑底局部平铺一层薄片。H394为圆形筒状坑,口大底小,口径约3.8、底径约1.6、深约5.5米。壁面可见工具修整痕迹,近坑底土层板结严重,坑底分布不均匀火烧痕迹。考古发掘所见窖穴具有容积大、坑底和坑壁

经防潮处理,坑内发现粮食遗存均可证明该类遗迹应是储粮之用的窖穴。大型储粮坑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西头遗址聚落的等级高和人口数量大的特点,为西周城址的聚落功能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西头遗址西周时期大型围沟墓地及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为揭示区域人群变迁及社会演进提供了新证据 上庙地点发现大量墓葬,墓地外围确认面积超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围沟平面近三角形,北侧、南侧围沟与城址东墙外壕沟相接,所见围沟长度约1120米,通过解剖,围沟宽8.0~8.3米,距地表深3.5~4.0米,填土较为纯净,出土遗物较少,通过出土陶片可判断围沟年代应为商周时期。围沟内发现墓葬近千座,2020年至2022年已在该墓地发掘中小型墓葬120座,马坑3座;2021年至2022年发掘甲字形大墓3座,其中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东西长约6.5、南北宽约5.2米,墓道长9.7、宽约3.3米,墓室内发现排列有序殉人38具,分三层埋,布满整个墓室,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底部有腰坑,M90出土大量海贝、蚌器、铜器残件、原始瓷器残片、骨器、石器、玉器及刻字卜骨等,该墓年代为商末周初。M98、M99亦为甲字形大墓,M98与M99墓道相接,前者墓道弧形,墓室方向与M99相一致,墓道长7.8、宽3.1~3.4米,墓室长5.3、宽4.6、深8.3米,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二层台残留有大量车马器,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M99位于M98南侧,墓道长21.5、宽3.6~4.0米,墓室长6.6、宽3.4、深7.9米,墓室棺槨扰动严重,出土有陶器、玉器、铜器、骨器、金箔片及蚌饰,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中型墓为东西向,墓室面积10平方米以上,多有棺槨,二层台有殉人,墓内见有腰坑并殉狗。小型墓葬多为东西向,亦见有南北向,一般随葬品较少,多见陶器、兵器及车马器。通过出土遗物判断,上庙墓地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值得关注的是,上庙墓地围沟外东部发现甲字形大墓十余座,另有中小型墓葬百余座。西头遗址围沟墓地的发现为探索商周埋葬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M90墓道大量殉人的发现,为商末周初人群迁徙及周王室对泾河流域的控制方式等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考古学材料。

总之,西头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为西头遗址商周时期聚落布局、人群构成及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学材料,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探索周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寻找文献所载“豳”与“京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